



大会

第六十八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七次全体会议
2013年9月24日星期二下午6时举行
纽约

主席： 约翰·阿什先生 (安提瓜和巴布达)

下午6时25分开会。

瑞士联邦主席的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瑞士联邦主席的讲话。

瑞士联邦主席于利·毛雷尔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瑞士联邦主席于利·毛雷尔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毛雷尔主席(以法语发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它是否正在变得更好,那是另一个问题。这得由我们来回答。我们往往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世界正朝着一个更美好、更和平的未来阔步前进。不幸的是,现实使我们看到令人失望的倒退。

我回顾150年前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1863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在日内瓦成立,从而引起一场全球运动。该组织的代表们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在世界范围内为受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影响的人们提供人道主义帮助。红十字委员会的人道主义工作基于中立、不偏不倚和独立等

原则。对冲突的受害者一视同仁。向所有弱势者提供帮助。平等珍视所有人。

瑞士与红十字委员会共同具有人道主义传统。除这一传统外,我国为具有可追溯到数百年前的另一个传统——中立——而感到自豪。我要回顾,数百年来,瑞士的外交政策一直基于各国之间和平共处。由于我们中立,我们同所有国家保持关系。我们永不选边站,但我们可以提供支助或建议由我们进行调解。此外,我们的中立使我们能够进行斡旋。

人道主义介入是我国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荣幸地提供我们的中立领土供进行和平会谈。我们将继续尽全力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特别是通过我们的斡旋这样做。这一不偏不倚的工作基于我们这样一个信念,即人与人之间和国与国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自然的。此外,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保护人权是瑞士所作承诺的关键要素。这些权利体现国际法所规定的各项义务,因而必须受到保护。瑞士对广泛存在的暴力行为和诸多侵犯人权的现象感到关切。它呼吁所有国家和民间行为体摒弃暴力。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506)。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13-48460(C)



在中东，暴力冲突正给平民造成不可接受的痛苦。叙利亚局势已经恶化到人道主义组织无力应对的程度。严重和蓄意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容忍的。这种罪行不论系哪一方所为都必须受到惩罚。正因为如此，我国与57个观点相同的国家一道，于1月份呼吁安全理事会将叙利亚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使用化学武器是一项特别卑鄙的罪行。当务之急是查明所有事实。铭记这一点，瑞士欢迎最近出现的事态发展。

我强调，国际社会必须不遗余力地为尽早在日内瓦再召开一次会议铺平道路。会议应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持久的解决办法，同时顾及所有叙利亚人的正当愿望。

瑞士不是唯一受平等权利原则约束的国家。《联合国宪章》赋予这项原则普遍有效性。《宪章》序言重申

“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之信念”。

这既适用于所有人，也适用于我们所生活的国家。因此，《宪章》在谈到所有人民的基本权利之后，明确提及“大小”各国权利平等。在《宪章》第一条第二项，联合国寻求

“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

《宪章》第二条第一项指出，

“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

我坚信，这些原则是世界各国人民和族群和平共处的基石。

但是，我们对此是否仍有充分的认识？抑或我们有陶醉于宏伟理想和次要细节的倾向？我所得到的印象是，在国际政治中，我们经常大谈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事情应该如何，而现实却谈得太少。我

不禁觉得，过度的官僚主义造成了另外一种平行世界，从而导致进一步脱离实际。最终，这将导致成本不断增加，具体结果越来越少。

全球性问题需要的不止是一般性讨论；首先需要寻求各方认同的解决办法。创立联合国就是为了寻找这种解决办法。为此，联合国必须是高效、创新和有效的。只有这样，它才能取得进展，确保所有人民和国家的平等权利。瑞士坚决承诺为这项任务作出贡献。时下有些事态发展与《宪章》规定的那些共同价值观相左。我想谈谈这些问题，也希望就能就这些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发起讨论。

作为一个具有长期人道主义传统的中立国家的代表，我不无担忧地观察到，强权政治回潮日趋严重。我注意到，大国再次选择运用其强权和武力，越来越不把小国视为平等伙伴。我诚挚希望这种趋势能够尽快得到扭转，否则，凝聚国际社会而且各国都感到致力于遵循的《宪章》基本价值观将受到质疑。

如前所述，我对国际舞台上出现的强权政治倾向感到担忧，因为我们认为，即使在尊重其他国家并接受各国人民和平共处规则的情况下，本星球上的国家也应该有自由选择自己的未来，而不必牺牲他们的特点。我们相信，各经济体之间和平竞争。我们相信世界的多样性，相信主权国家和平的多样性，作为平等伙伴，相互公平对待。人民有自由制定他们自己的宪法，决定他们自己的经济秩序和法律制度。任何国家都不能把本国的法律强加给另一个国家。只有通过谈判，而不是以发号施令的方式解决问题。国际法的共同规范和规则的存在，就是为了防止弱肉强食现象。主权与平等权利等项原则是和平与稳定的保障，并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这些信念是《联合国宪章》的基础。我们今天是否仍然认同这些信念呢？

最近大国对待小国的方式让我感到不安，因为我经常得到的印象是，有人将武力置于法律之上。

联合国活跃于范围广泛的各领域。或许，存有的风险是，联合国因涉及面太广而看不到本质和具体事物。但凡遇有危及联合国创立之基本原则的情况，本组织及其会员国似乎常常不知所措。让我们永不要忘记支撑这些原则的基础：人民的平等权利，国家的主权和平等权利。它们是历史经验教训的体现，而这部历史是一个压迫、外国统治和冲突的悲惨故事。

在我们必须一起决定，我们想要走哪条路。我们是否想继续在次要利益的问题上浪费我们的精力？我认为，我们应该现在就从这里做起，去努力重申和实践联合国的价值观。让我们致力于建成一个所有国家和人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具有同等价值的和平世界，一个权利高于实力的世界。今天大会在座的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尽我们所能去实现这项目标。让我们立即开始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瑞士联邦主席刚才的讲话。

瑞士联邦主席于利·毛雷尔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何塞·穆希卡先生的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何塞·穆希卡先生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何塞·穆希卡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穆希卡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来自南方。我国位于大西洋和拉普拉塔河交汇处，是一个气候温和、畜牧业发达的平原国家。其港口、皮革、腌牛肉、羊毛和肉类有着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我国有过刀光剑影的黑暗年代，直至20世纪

初，我们的社会、教育和政务工作终于位居世界前列。我要说社会民主体制是乌拉圭发明的。

将近50年来，世界都把我们视作像瑞士那样的国家，其实在经济方面，我们是大英帝国的混血儿。大英帝国终结时，我们的贸易条件极为恶劣，我们过去近50年来一直在怀念马拉卡纳体育场的胜利，渴望重拾昔日辉煌。今天，我们在从苦痛中汲取教训，再次登上全球化世界的舞台。我本人的故事是一个小男孩——因为我曾经是一名小男孩——的故事，我和其他人一样，希望改变自己的时代和世界，梦想有一个没有阶级的自由社会。我的错误在部分程度上是我所处的时代造成的。显然，我对这些错误承担责任，但有时我会呼喊：“我现在要是当年心怀这种乌托邦想法时的劲头就好了”。

不过，我回首过去不是因为今天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源于昔日的肥沃灰烬。相反，我生活在地球上不是为了算旧账或是怀旧。我对自己看不到但却为之奋斗的未来深感焦虑。是的，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更有人性的世界，但今天的主要任务恐怕是挽救生命。

我来自南方国家，我是从南方国家来到大会这里。我与生活在拉丁美洲城市、丛林、平原、大草原和峡谷的数百万贫穷同胞同呼吸共命运，而拉丁美洲是我们正在创造的共同家园。遭受破坏的土著文化、马尔维纳斯的殖民主义残余、对加勒比阳光照耀下的古巴实施的徒劳无益、令人遗憾的封锁压在我的肩上。我也承受着电子监视的后果，这种做法只会造成不信任，给我们造成不必要的破坏。我还背负着巨额社会债务以及捍卫亚马逊、海洋和我们美洲大河的义务。我也有义务为了我的祖国而为所有人奋斗，使哥伦比亚可以重获和平。我有义务为那些与众不同而且我们与之存在不同或分歧的人受到宽容对待而奋斗。对于和我们想法一致的人，无需考虑容忍与否。宽容是和平共处的基础，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大家都不一样。

我反对非法经济、贩运毒品、偷盗、欺诈、腐败，它们是相反的一套价值观以及坚持认为我们只

要更富有——而不论采取什么手段——就会更幸福的人给当代带来的祸害。我们放弃了原有的不崇尚物质的神灵，现在正将市场这个上帝供奉在我们的殿堂。这个上帝是我们的经济、政治、习惯和生活的组织者，甚至为我们定好了利率，提供了信用卡和幸福的幻觉。好像我们生来就是为了消费，而当我们不再消费时，我们就会被沮丧、贫困和自暴自弃所吞噬。

的确，如今为了消费以及掩埋科学称之为“碳足迹”的垃圾；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希望像普通美国人那样消费的话，我们就需要三个地球才能生存。换句话说，我们的文明提出了一个欺骗性的挑战，按照现在的方式继续下去，所有人实现该目标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的文化越来越受到财富积累和市场力量的推动。有人许诺让我们过上消费和挥霍的生活，但这实际上只是自然和未来人类毁灭的倒计时。这种文明敌视简朴的生活、清醒的态度以及所有自然周期；更糟糕的是，它敌视自由，而自由意味着要有时间体验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最重要的事物，即爱情、友情、冒险、团结和家庭。这种文明敌视闲暇时间，这种时间既不挣钱，也不能买到，但能够让我们思考自然之美。

我们已经破坏了真正的丛林，建造了无名的水泥丛林。我们用走路对抗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用安眠药对抗失眠，用电子产品对抗孤独。我们远离了人性，还能感到幸福吗？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都愚蠢地放弃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则，代之以功利性的消费主义和财富积累，而本来的原则是为了生命本身而维护生命，因为生命是至高无上的。

政治是人类一切努力的永世之母，却依旧受到经济和市场的束缚。从一次冒险到又一次冒险，政治取得的成果除自身循环不停外微不足道。为此，它下放权力，在疑惑中打发时光，为政府谋利。人类历史在失控中向前迈进，买卖一切东西，推陈出新，以便谈判那些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讨价还价的东西。万物都可营销：墓地和殡葬服务；产房；父亲、母亲、祖父母、舅舅以及秘书；汽车；还有休

假。万物都是生意。营销活动刻意以儿童为目标，从心理上影响年龄稍大的儿童，以便为未来预留安全领地。有充分证据表明存在这种令人憎恶、有时令众人深感挫折的使用技术的情况。

一般的城市居民徘徊于金融机构和有时靠空调调节温度的办公室的单调乏味的例行惯例之间。他时常梦想着休假和自由。直到心脏停止跳动，直到死去，他都在梦想能够有能力支付各种账单。其他劳作者则任由市场宰割，在物质积累中同流合污。

危机确实源于政治的无能为力，它无法理解到：人类无法也不会逃脱民族主义，因为它实际上已铭刻在我们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中。今天，到了为准备建设一个无边界的世界而奋斗的时候了。

全球化经济背后唯一的推动力是极少数国家的私有利益，每个国家都寻求保持其自身的稳定。今天，我们各国人民的伟大任务和我们看待事物的谦恭方式变为“成就一切”和“结束一切”。仿佛这还不够，真正生产性的资本主义已沦为正处于全球权力巅峰的银行的囚犯。更清楚的是，世界叫嚷着要采取尊重科学成果的全球规则，尽管这些科学成果俯拾皆是，但是，管理世界的却并非科学。

今天，我们需要定义一长串东西。我们必须界定世界各地的工作时间。我们需达成各种货币间的统一。我们需为全球获取水源和防止沙漠化的斗争提供资金。我们必须想出如何更多地回收利用和如何防止全球变暖的办法。每一项人类任务的局限是什么？

我们必须达成广泛的全球共识，动员大型经济体不生产一次性物品，而是生产有用的、没有计划过时或过剩、将有益于世界上最贫穷者的物品，从而在受压迫最沉重的人们中形成团结，惩罚浪费和投机并对其征税。有益的物品可抗击世界贫困。在全球范围内转向有益的新凯恩斯主义，铲除世界上最臭名远扬的令人难堪的事物将比发动战争有益一千倍。

也许我们的世界不需要这么多全球性组织、有组织论坛和会议，它们只会帮助连锁酒店和航空公司；也许没人真正从它们的决策中获益。我们必须回归人类生命中古老和永恒的东西，连同力求为人类而非富人服务的科学。有了科学家这些人类的心灵顾问，我们可以为整个世界达成协议。无论是大国还是跨国公司，更不必提金融系统，都不应治理人类世界。是的，与科学智慧相结合的高尚政治，必须源于不为物质成果所吸引，而是展望未来并告诉我们可能无法预见事物的科学。多少年前，他们在京都告诉过我们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某些事实吗？

我们终于明白：必须情报当先，指导船只驶向港口。这种性质的行动和其它我们叫不出名字、但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行动需要的是生命，而不是所获得的财富。显然，我们并不幼稚；这些东西和类似的其它东西不会发生。然而，我们仍面临很多无谓的牺牲。我们仍不得不对后果而非处理起因。今天，由于全球高尚政治插手一切却一败涂地，世界无法为地球制定全球规则。

我们一度或多或少地受到旨在建立具有欺骗性的所谓自由贸易，但最终却在世界上一些区域建立了保护主义和超国家壁垒的区域协定的保护。相应地，致力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重要工业和服务部门将会出现。我们将因此而感到宽慰一段时间。我们的注意力将分散。

但当然，令金融系统感到高兴的是，积累将继续有增无减。战争和狂热将持续下去，直至大自然要求我们负起责任，使我们的文明再也行不通。或许我们的眼光过于简单，不够有同情心，我们把人视作一种独特的生物，是地球上唯一能够伤害自己同类的生物。

我重申，一些人所说的我们星球的生态危机是由于人类的贪婪压倒了一切。这是我们的胜利，也是我们的失败，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去适应我们帮助建立的新纪元，但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为什么这样说？数字能说明一切。事实上，过去100年来，全球人口翻了两番，而国内生产总值则增加了至少20倍。1990年以来，世界贸易大约每6年就翻一番。我们可以继续列举数字，清楚地确定全球化的走势。我们周围在发生着什么？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纪元，而且速度很快，但是，在我们无法掌控的可怕、不断加快的变化面前，我们的政治机构、文化配套、党派以及青年都变得落后了。我们无法应对全球化，因为我们不具备全球思维。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文化上的限制，还是我们正在达到生理的极限。

我们时代存在的变革先兆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前所未见，但是，我们的时代没有一个有意识的方向，甚至没有基本的本能的方向，更不用说有组织的政治方向，因为我们甚至还没有可以用来应对未来迅猛变革的理念起点。

贪欲一直是这样一种消极的力量和历史推动力，它也推动了物质、科学和技术进步，这些进步成为我们这个纪元和时代的特征，并且使我们得以在许多不同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与此同时，矛盾的是，也正是这个工具一推动我们利用科学和变革技术的贪欲一在把我们推到一个黑暗深渊的边缘，走向未知的命运，一个没有历史的纪元，让我们失去目光和集体智慧，无法继续克隆和更新我们自己。

如果说人类这个小小生物有一个特点的话，那就是，它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征服者。似乎事物生来臣服于人类。这些事物比比皆是，微光使我们能够辨别这些事物，或者至少指明事物发展的方向。但是，显然不可能就大局作出集体的、全球的决定。个人贪欲很容易战胜我们这个物种的贪欲。让我们明确一下。我们谈的大局是什么？大局就是地球上包括人类生命在内所有生命的系统，其一切脆弱平衡使我们不可能继续我们目前的做法。

另一方面，这一点更不容质疑，也更明显，尤其是在西方，因为我们确实来自西方，尽管我们

也来自南方，共和国应运而生，宣称人人平等，没有优劣之分，而政府应当代表共同利益、正义与公平。这些共和国常常变异，习惯性地忽略常人、街头的老百姓、普通人。创立共和国不是为了压倒它们的选民，相反，它们是一种历史现象，目的是为他们自己的人民行使职能。因此，它们必须对大多数人负责，并且必须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

至于我们各国社会中的封建主义残余，或者盛气凌人的古典传统，或者包围我们所有人的消费文化，共和国在它们存在的过程中，常常采取一种排斥普通人并与它们保持一定距离的日常生活方式。事实上，普通人应当是共和国政治斗争的核心原因。共和制政府从其生存方式和应对方式来说，应当越来越与它们所代表的人民相似。

实际上，我们往往培育与时代不合的封建事物、被宠坏的装腔作势之举以及等级之分，它们破坏共和国的最佳特性，也就是，人与人之间没有优劣之分这个事实。这些和其他因素之间的互动，使我们一直生活在史前时期，如今只要政治手段失败，就不可能放弃战争。因此，经济被扼杀，资源被浪费。在我们地球生命的每一分钟中，我们在世界各地把200万美元用于军事预算——每分钟200万美元。对各种疾病进行的医学研究，勉强获得军事预算数额的五分之一，而医学研究已取得巨大进展，并且是有望延长寿命的福音。我们无法逃脱的这个进程，会延续仇恨、狂热主义和猜疑，并助长新的战争和浪费财富。

我知道，在政治上很容易在国家一级进行自我批评，并且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建议，把可以节省下的资源用于其他有用的方面，是天真的。再说一遍，如果我们能够达成全球协议并进行全球性预防工作和制定旨在确保和平的世界政策，并向我们中最弱小的国家提供目前不存在的保障，就能够这样做。为了处理地球上最可耻的事情将必须裁减巨大的资源，但只要提出一个问题便已足够。如果没有这些保障，今天的人类将何去何从？因此，每个人都炫耀同其规模相称的武器。

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况，因为我们作为个人勉强能够进行推理，更不用说作为一个人种。全球性机构在争执不停的列强的阴影之下凋萎，尤其是在今天。这些国家显然想要保持权力。它们阻止联合国的行动，而联合国是建立在人类和平的希望和梦想之上的。但更糟糕的是，它们把它同全球民主隔开。我们并不都是平等的。在有强有弱的世界，我们不可能是平等的。结果，我们的世界民主受到伤害，并且我们面对无法达成一项全球和平协议的历史性障碍。当疾病爆发时，人类按照这个或那个大国的愿望进行补救，而我们却远远地站在一边观望。

很难发明一种比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更为糟糕的力量。民族主义是一种通过非殖民化进程解放弱者的力量，现已成为强者手中的压迫工具。这种例子在过去200年里比比皆是。由于缺乏权力和自主性，尤其是不承认占世界大多数的弱者的民主，联合国正在凋萎并越来越官僚。

举一个非常小的例子，从绝对数字来看，我们这个小国是拉丁美洲最大的维持和平特派团的部队派遣国，并且哪里有招唤，我们就去哪里。但我们是一个弱小国家，在分配资源和作出决定的场合，我们连请人喝咖啡的资格都没有。我们在内心深处渴望帮助人类摆脱史前时期——靠战争谋生的人仍然生活在史前时期，尽管他们可以制造许多器物——但只要我们不脱离史前时期并且不放弃在政治手段失败时诉诸战争，这就是等待着我们的长征和挑战。我们是在完全知悉的情况下说这些话的；我们熟知战争的寂寞。

但是，为了这种理想，我们需要奋力制定世界协议的议程，能够开始指引我们的历史并逐步战胜生活中的威胁。我们人类需要一个超越个人主义的全人类的政府，造就走科学道路的政治领袖，而不是仅仅追逐那些对我们进行管理和令我们窒息的人的直接利益的政治领袖。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明白，世界的穷人并非来自非洲或拉丁美洲；他们都是全人类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帮助他们

发展，以便能够过上像样的生活。必要资源是存在的。它们可以在我们的掠夺性文明的垃圾中找到。

几天前，有人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消防站举行了一个表彰仪式。有一个电灯泡连续亮了100年。它连续亮了100年！他们从我们的口袋里拿走了多少百万美元来蓄意制造垃圾商品，以便人们不停地购买？但全球化意味着给我们的地球和我们的生活带来残酷无情的文化变化。这是历史对我们的要求。整个物质基础已经改变。它改变了人类。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我行我素，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不是我们控制全球化，而是全球化控制我们。

近20年前，我们讨论了微不足道的托宾税。此税未能在全球实行。所有财力雄厚的银行都起来反对它。它们的私有财产以及谁知道多少其他财物将会受到损害。然而，这一担心似是而非。利用才能和集体努力，利用科学，人类能够逐步使沙漠变绿；人类能够将农业带到海上；人类能够发展靠海水存活的农业。

人类的能力如果侧重于至关重要的事情，就会无穷无尽。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大的能源。我们对光合作用知道多少？几乎一无所知。如果我们一道努力，妥善使用，世界上就会有大量能源。我们可以消除地球上的贫困。我们可以建立稳定。子孙后代如果开始作为人类而不只是作为个人考虑问题，就可以将生命带到各个星系，并追求我们人类基因中所拥有的这一征服梦想。

但是，如果要使这些梦想成真，我们就必须控制我们自己，否则我们会灭亡。我们将会灭亡，因为我们不能达到我们一直在努力发展的文明水平。这是我们的难题。我们不应当将我们的时间仅用于改正后果。让我们考虑根深蒂固的起因，即浪费成性的文明，从人的生命中偷走光阴并将它浪费在无意义事情上的目前文明。

副主席贝克先生（所罗门群岛）主持会议。

让我们记住，人的生命是一个奇迹。想一想，人的生命是一个奇迹，我们是由于一个奇迹而活着，没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更重要。我们的生物义务最重要的就是尊重生命、促进生命、照顾生命、繁衍生命，并理解有人类才有我们这个道理。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刚才的讲话。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何塞·穆希卡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先生的讲话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约韦

里·卡古塔·穆塞韦尼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穆塞韦尼总统（以英语发言）：2000年，我们在这里举行会议，并商定了到2015年的千年发展目标。它们是：目标1，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目标2，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目标3，促进两性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目标4，降低儿童死亡率；目标5，改善产妇保健；目标6，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目标7，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以及目标8，全球合作促进发展。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那样，除非我们进行社会经济变革，否则就不能可持续地实现这些目标。这意味着要从作为不发达国家的特点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由中产阶级和拥有技能的工人阶级组成的新社会。

我们传统非洲的旧社会过去和现在都必须经历社会经济变革，就像昆虫那样，同一有机体采取各种新的生命形式——卵、毛虫、蛹、成年蝴蝶或其

他昆虫等等。这意味着从事农业的人少于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的人，城市中心的人口多于农村地区的人口，没有文盲，发展现代农业而不是仅能维持生存的传统农业或给受影响家庭带来很少收益的非经济性的殖民地经济作物。我希望，没有人幻想我们能在保持落后经济的同时持续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我们在乌干达发现社会经济转型面临以下“瓶颈”。

首先是思想混乱。其次是国家薄弱，没有军队，及警察、司法和公务员制度薄弱。第三是基础设施不足，包括电力不足，缺乏公路，没有铁路系统，缺乏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等等。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在这样一个国家办事成本高，因此导致企业避而远之。而没有企业，就不会有就业机会、商品生产和服务，无法扩大税收基础。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第四个瓶颈是缺乏教育和健康状况不佳，因此人力资源不发达。一个文盲和不健康的人口，不能促成社会经济转型。第五是非洲殖民地巴尔干化，导致内部市场狭小的问题。必须通过区域市场一体化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口购买其产品，企业无法持续产生。

第六是缺乏工业化和未能实现服务现代化，这意味着我们继续以最终产品价值10%或者更低的价格出口原材料，因此造成资金和就业机会外流。缺乏现代服务意味着，我们无法吸引旅游者，因此不仅不能创造就业机会，而且不得不从外部进口专业和医疗等形式的服务。

第七，农业未能实现现代化，会限制相关人口和国家的盈利能力，抑制就业，影响粮食安全。

第八，受对国家利益的不正确分析的影响，又发生干涉私营部门的错误。私营部门是回汇红利导致国民经济大出血，还是注入新资金和知识扩大经济规模？所幸，在乌干达和非洲大部分地区，这个错误已经得到纠正。

这些都是直接影响社会经济转型速度的瓶颈。我不想在此谈论政治瓶颈。

因此，我们乌干达从一开始就清楚所有这些问题。不讲这些战略瓶颈，持续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就无从谈起。国家不可能持续以捐助者支持作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基础。

尽管我们有些部门犯了一些错误，但乌干达到2015年将实现下列千年发展目标。

第一，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已实现）；第二，普及小学教育（已实现）；第三，促进性别平等（已实现）；第四，降低儿童死亡率（已实现）；第五，改善孕产妇保健（由于我们所犯的错误，实现这一目标的进度缓慢）；第六，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我们正按计划实现这一目标，但新感染艾滋病例除外，这方面病例略有增加）；第七，确保环境可持续能力，办法是提高经济电气化程度，从而停止砍伐森林以获取柴火的做法；改造原始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以及将更多的农业人口转入工业。

我们一直在努力实现目标8：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促进发展。其做法首先是促进非洲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并争取在互利的基础上进入世界其他地区的市场。已经以东非共同体、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形式开始非洲市场一体化进程。

作为全球伙伴关系的一部分，我们应该谨慎从事，不要失去因冷战结束带来的全球紧张关系的缓和。耶稣在《马太福音》中说：

“凭着它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它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

火里。所以凭着它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它们来。”（《圣经》，《马太福音》7:16-20）

一个好制度将以实例证明其优越性。《马太福音》还说：

“同样，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同上，《马太福音》5:16）

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对付犯罪分子而制造新的全球紧张局势。需要国际行动时，我们应该寻求区域和全球共识，正如已故毛泽东主席所说，我们应当团结大多数，打击极少数，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在需要争取自由的地区，被压迫人民可以为自己而战。他们不需要外部势力的资助。那些以寻求外部资助为主要目的的人，至少可以说他们的动机是值得怀疑的。

仍然关于全球伙伴合作，我不得不强调，我们对开始习以为常地在非洲问题上不顾非洲联盟立场的那些行为体感到愤怒。在非殖民化斗争中，我们的口号之一是建立“非洲人的非洲”。有人似乎认为这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他们错了。虽然非洲爱国力量对老牌错误制造者再度盛气凌人感到意外，但他们将作出适当反应，保护非洲抵御霸权。

傲慢的最新表现是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对肯尼亚选举产生的领导人的做法。很多非洲国家之所以支持成立刑院，是因为我们憎恶有罪不罚现象。然而，国际刑院继续以浅薄和心怀偏见的方式对复杂的非洲问题作出不当处理。这是不能接受的。国际刑院应予停止。我们对它的建议来自一些非常能干的行为体，这些行为体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有把握。肯尼亚正在恢复。应该让它恢复。我们知道过去错误的根源。国际刑院的做法不是处理这些错误的正确做法。

副主席米库列斯库夫人（罗马尼亚）主持会议。

在我们争取社会经济变革的斗争中，我们最大的问题一直是筹资问题。伊迪·阿明摧毁了乌干达小型现代殖民经济。最初，在我们艰难地争取实现最低程度的经济复苏时，我们不得不依赖外部资金。这种资金虽然有用，但比较有限，来得比较慢，并非总是具有针对性，而且不稳定。尽管过去20年间我国经济得以实现年均6.5%的增长率，但我们本可以达到高得多的增长率，特别是如果我们有可靠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的话。

现在我们自己有了一点钱，就可以更快地开展基础设施项目。尽管没有油气，我们仍得以通过自力更生，在基础设施发展方面迈出更快步伐。当然，新增外部资金如果具有针对性、数额较大并能够及时到位，会是非常有益的。无疑，乌干达和非洲大部分国家正在坚定地向前迈进。有了我们几年前发现油气产生的收入，我们将能够为我国基础设施方面的所有需要提供资金。未来是光明的，我们前进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乌干达共和国总统刚才的讲话。

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女士的讲话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阿根廷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女士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女士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她向大会讲话。

费尔南德斯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愿特别祝贺大会主席及其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员安提瓜和巴

布达。他正在主持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这让所有拉美人都感到荣耀。

我首先要对肯尼亚和巴基斯坦袭击事件受害者，以及对于世界各地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的所有受害者表示声援。我这样说不是出于官腔式的同情或礼仪原因，而是因为我国阿根廷和美利坚合众国一样，是美洲大陆唯一遭受过恐怖袭击的国家——就我国而言，是两次——即1992年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以色列使馆被炸，两年后阿根廷犹太社区中心AMIA被炸。一些受害者亲属今天也和往年一样与我们在一起，我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显然，我们说的是受害者。他们不是士兵或战士。他们是坐上公共汽车，或许是走进酒吧或是去工作的人，爆炸让他们感到意外。他们没有参加过任何战争；当时没有战斗员或士兵；他们没有选择去打仗。所以，我想到的是这些受害者及其家庭，我们应当向他们表示声援，并最强烈地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就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的范畴而言，我们认为叙利亚问题是一条共同的主线。就在刚才，我还在联合国这里主持安全理事会会议，这差不多是一种预兆。阿根廷是安理会2013-2014年非常任理事国。8月6日，也就是大约仅一个半月之前，我们曾就改革安全理事会问题提出方案。我们当时表示，安理会的运作和存在基础实际上反映的是另一个时代，即冷战时代。当时对于核浩劫的恐惧促使了本组织的成立，使击败纳粹德国的力量团结起来，但后来导致了两极世界的出现。对于核战争的这种恐惧导致了一套包含了否决权的制度，目的是为了任何人都不能按动按钮来毁掉这个世界。事实是，现已表明，1945年时有用的这项工具已经失去作用而且完全过时——不仅对于叙利亚问题是如此，对于处理影响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也是如此。

顺便说一句，我们对于第一次给我们机会这么晚发言表示感谢，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会议死气沉沉的局面。有时，我们来参加这些会议会带着固定的模式，几乎是作独白，这让我们难以在考

虑到前面发言者所作发言的情况下发表观点和作出反驳。我非常认真地听取了今天早些时候所作的几乎所有讲话。显然，我特别关注了谈及全球决策系统的发言，而且因为我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我当然对第一个讲话，即潘基文秘书长的讲话，给予了高度关注。

在这些发言中，我听到许多都提及了8月21日。8月6日，我们谈到必需改革安全理事会，否决权已不再有必要。应该有一种制度——像南美洲国家联盟、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或南方共同市场及其联系国所使用的那种制度——在其中，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做决策。为什么要这样？政府的行政管理有所不同，因为否决权对于管理是必要的。在处理冲突的解决与管理时，如果冲突一方或有关一方拥有否决权，那么这种权利势必阻碍冲突的解决。当时我们并不知道15天或16天后会发生什么。许多人指出，叙利亚危机是8月21日爆发的。

事实上，很难理解，只是到8月21日我们知道化学武器问题时，才承认叙利亚当前的危机。叙利亚陷于这场冲突已超过两年半时间。15万多人丧生，其中99%的人死于常规武器，而不是化学武器。我记得，在二十国集团上一次会议讨论叙利亚问题期间，我问道，“子弹、杀伤人员地雷、导弹或手榴弹致人死亡与化学武器致人死亡有何不同？”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为之一震。既然这并非第一次，为什么说起化学武器仿佛这是首次使用化学武器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似的？

我记得今天另一位领导人在讲话中提到纳粹可怕的毒气室、战壕中的毒气和其它情况下使用的化学武器。我还记得听说并读到过——因为当时我尚未出生——广岛和长崎的核屠杀以及使用这些武器给日本多代人造成的影响。

我记得我年轻时——乌拉圭总统也回忆了他的青年时代——，那时我还不到20岁，其他许多人可能也记得——越南战争期间使用了凝固汽油弹和磷。荣获普利策奖的赤身裸体的男孩和女孩的照片

永久地记载了这一幕。我清晰地记得，那个赤身裸体的小女孩在轰炸中被凝固汽油弹击中后在路上奔跑的情景。

公平地说，我也记得，美国人民看到机舱门打开、被包裹在黑色塑料袋中那些战死沙场的士兵尸体被抬出来时的痛苦。我可以想象阵亡士兵的每一位女友、姐妹、妻子以及女儿的痛苦，同时她们都试图搞清为什么会这样。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这些士兵要去远离祖国千里之遥的地方送命。这太不合理，太不公正了。正义的战争是不存在的。只有和平是正义的。

8月6日，在关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讨论中，有人指出，和平与安全不是军事概念；恰恰相反，它们是政治概念。今天，我欣然听到秘书长提及我们在安全理事会提过的这个概念，即和平与安全不是军事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因此，我们欣见就叙利亚问题达成协议。我国反对直接干预——轰炸。这相当简单。以造成更多死亡来避免死亡的论调是任何理论、甚至是常识都无法支持的。当时，我们直言不讳并非是为说而说。此外，我们讨论的并不是随便什么国家，而是一个高度遵守国际法规范的国家。

我国——阿根廷——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在为和平与科学目的开发核能方面，使阿根廷成为即便不是最先进的国家，也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我们向埃及、阿尔及利亚以及澳大利亚出售了核能发电机。我们还为医学目的利用核能。我们不会一边谴责在战争中使用核能，一边却部署核潜艇。例如，在涉及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我们的经历就是这样，而联合王国则把南大西洋区域军事化并派出核潜艇。我们不搞双重标准。我们不虚伪。正如秘书长在其发言中所提到的那样，我们不仅签署了《不扩散条约》，而且还是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

换句话说，我们在论及谴责独裁者时，我们确实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可以在国际刑院出庭。我们还是驻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的美洲人权委员会的成员。令人好奇的是，许多国家大谈尊重人权、相关机构、国际法、国际刑院并常常提及人权问题时，却并未签署这方面的条约。

谈到人权问题，阿根廷取得了大量成果。我们是本组织的创始国，倡导在联合国内部成立一个人权问题秘书处，并推进《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五月广场母亲协会的会长在此与我一起与会。她还与我一道在巴黎签署了该条约；我们也是该条约的创始国。

我提及人权问题是因为今天另一篇发言讲到了一些关于人权的事。发言者在这里说，如果人们想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那么，他们就应当这样说，并且作好面对令人不寒而栗的万人冢准备。阿根廷也可以谈一谈万人冢。即使是今天，在进入21世纪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仍然会看到乱葬坑，其中埋葬着几千名犯人，还有在1976年3月24日开始的灭绝种族独裁政权期间失踪的人，与之相似的是1973年9月11日在我们的姐妹共和国智利夺取政权的独裁政权，它推翻了民主选举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

大家发言谴责了种族灭绝独裁者，如果当时有人去帮助阿根廷和智利以及美洲大陆的许多其它人民，那该有多好，那个时候，冷战正酣，这些人民成了刽子手独裁者的牺牲品。但是，发言者还在这里指出，如果有人出于关心人权而为他人采取行动，或许如果这种关切至少刚好符合某个大国的利益，它们原本可以采取不同的做法。我们在这里谈到过这些问题，包括必须结束这种双重标准，我们也说过，联合国等多边组织的决议和决定必须在对弱国和强国、小国和大国一视同仁的公平竞技场上作出。

我们从1965年以来一直在等待，当时，大会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和多项决议都要求阿

根廷和联合王国坐下来进行对话——“对话”是我在所有演讲中反复听到的另一个词。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问题存在争端，然而，联合王国对此不屑一顾。因此，我们继续面对双重标准，有些人不想听到我们提及这一点。但是，伪君子就像巫婆，显然，他们确实存在。

我还听到——我应当补充指出，我高兴地听到，因为并非所有事情都与双重标准有关——至少人们承认，作为开始解开中东问题死结的必备基础，必须承认巴勒斯坦国，并且承认以色列国在其境内安全生存的权利。我认为，大家说得很对，除非也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存在，并且支持它确实能够实际存在，否则不可能实现以色列国的安全。我们必须赞同这一定性。

我还听到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新任总统的发言，我也听到关于大国带来了该国政府改变的评价。如果我的理解正确的话，在面对伊朗共和国新政府时，似乎对改变有了一种新的期望。大会知道，我们与伊朗存在分歧，这是由于阿根廷司法部正式起诉五名涉嫌参与炸弹袭击阿根廷以色列人互助协会的案件，这也是我的一项工作。自阿根廷时任总统内斯托尔·卡洛斯·基什内尔于2003年5月25日首次在这个大会堂要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予以合作，以便澄清这起案件的事实以来，10年过去了。基什内尔总统每年持续不断地发出呼吁，直至2007年，而从2007年直至今日，我本人也继续这样呼吁。一年多以前，我们得到了当时伊朗外长的答复，他提议启动会谈，并就合作达成了协议。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案子已搁置了19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如果有五个伊朗人被指控，我能够并且必须与之对话，以便法官能够从这五个人那里取证的对象显然是伊朗共和国。这看起来非常明显，但往往在这个奇特的世界中，甚至在我本国——我国也有一些奇特——对显而易见的事情必须加以解释。

我今天还听到了不完美的选择这个词。我喜欢这个说法，有一位总统使用了这种说法。我认为，

如果阿根廷花了十年时间要求合作，然后，最后有人突然表示：“好吧，我们来谈一谈，我们愿意合作”的话，我想，除了共同坐下来以外，没有其它可能的选择。在我国国内，有人曾利用这个问题对我们进行政治攻击，在美国这里，兀鹫基金也利用这个问题，让美国国会与我们作对。他们说，我们正在与伊朗达成一项协定，一项条约。但是，协定的内容是什么？是核武器？不是。是结成战略同盟攻击西方？不是。是皈依伊斯兰教的协定？不是。这项协定仅只是为了打破程序僵局，使阿根廷司法部门可以对被指控者取证，同时通过一个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来确保适当法律进程，这些法学家既不是伊朗人，也不是阿根廷人，他们的行动也不具有约束力。我国在9个月前批准了这项条约。如果用生物学术语或者用生孩子来打比方的话，我可以这样说，孩子马上就要降生。所有适当机关，包括议会都批准了这项协定。在政府公报中公布了协定。世人知道，阿根廷恰当地履行了这项协定。对于认为这项协定让伊朗占了便宜的人来说，在伊朗当局没有发出任何消息或通知，也没有签定任何协定9年之后，我们肯定并说明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对的。

确实，现在有了一个新的伊朗政府，我仔细聆听了它的发言，还有一位总统，他在我读到的讲话中宣布，他绝不会否认大屠杀。这一点非常重要。至少对我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公民来说，这是重要的。甚至在今天，他特地宣告，通过最近的选举，伊朗社会证明它想要采取更加温和的立场，这场选举取代了一个领导人，他的立场众所周知，因此我无需再重复。就在这个讲台上，就从这些麦克风里，我们听到有人说，有意愿达成协议、进行会谈、建立一个开放而和平的民主社会并本着善意采取行动。

法国总统提到伊朗的核问题这个重要事项；我要谈谈阿根廷犹太人互助协会问题作为另一个大问题。他们说，他们将作出愿意谈判的姿态，而且不想获得用于军事目的的武器。换言之，据我理解，

他们说他们将坚持我们所支持的不扩散。我们现在等着别人通知，该协议是否已被批准，或者什么时候会批准。此外，我们在等待宣布该委员会成立的日期，以及阿根廷法官前往德黑兰的日期——是的，前往德黑兰；我们不害怕，我们定会去那里。

我们相信人们的善意，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真正想要和平。在这里发言的每个人都讲，他们想要和平并且他们彼此相爱，因而我们相信所有人。但是，我们也希望看到每个人的言行一致。因此，我要把这个具体问题提出来。我毫不怀疑，如果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是真话，我们定会看到一种积极的反应。我这样说，是为了避免我们对国际法条例的深刻信念和信仰有任何误解，并且也是为了表明，我们的耐心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天真的，甚至是愚蠢的。我们认为，已经过去足够的时间。我们认为，现在需要的是答案。受害者应该得到这个答案。假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真正想要向世界表明，这是一个不同的政府，而且其行动也不一样，它也应该得到这个答案。我相信情况就是这样。我没有理由不这样认为。

至于我想讨论的其他问题，请允许我指出，关于国际法准则，我们是“连环遵守者”。我们也是当今金融和经济领域非常重要的另一些不成文规则的“连环受害者”。就阿根廷2001年的情况而言，这些不是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风险评级机构或像秃鹫基金那样进行投机的那些机构编写的准则，用于对付像阿根廷那样拖欠债务的国家。

也有人在这里说到贫困以及儿童接受教育的必要性。我愿宣读秘书长两段的讲话。第一段涉及武器。他在这段中谈到贫困并指出，“在有着紧迫的人类需求之时，武器费用却仍然荒唐地居高不下。让我们厘清事项的轻重缓急，将钱花在人身上，而不是将数十亿美元浪费在致命的武器上。”(A/68/PV. 5, p. 3)

我正式指出，阿根廷不生产任何化学武器，甚至也不出售常规武器。正如我在20国集团会议上提

到的那样，颇有意思的是，查明谁在向同叙利亚政府作战的反叛团体供应武器。不用说，叙利亚政府拥有一个国家该有的武器。我们想知道，谁向那些同叙利亚政府作战的人供应武器。这无关乎站在任何一边的问题；而只不过是提出一个相当合理的问题，因为武器贸易今天已成为真正的生意。

我们是否确实得等到1 000人被化学武器杀死，才意识到另外15万人已在他们之前死亡呢？为什么没有在两年前就宣布武器禁运，以防止这么多人死亡呢？不过，这个问题应当由卖武器的人来回答。我们不卖武器，因此，尽管我们猜想它会是什么，但无法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还要宣读秘书长关于经济形势方面另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叙利亚问题是贯穿整个大会的共同线条，可显而易见的是，尽管我们在这里看见和听到各种各样的事件和言论，但随着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破产而在美国这里开始的经济危机，仍在继续制造动荡和脆弱性。脆弱性是常常引用的措辞，不仅在20国集团中。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这使我们非常清楚地想起2001年阿根廷拖欠债务时的情形。这同一个事实有关联，即，我们也是游说者、风险评级机构以及那些金融衍生品交易商和像盘旋在拖欠债务国家头上的秃鹫那样以极低价格买进证券然后企图牟取暴利的投机者们的各种不成文规则的连环受害者。这就是阿根廷的情况，但可能成为任何其他国家的故事，实际上会很快发生。

自从前总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政府最初于2003年5月25日就职以来，阿根廷开始探索如何摆脱相当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160%的债务。我们的失业率为25%、贫困率是54%，而且极端贫困者超过30%。也许很多国家可以在这种状况中看到它们自己的影子。

我们在2005年开展了获得我们76%的债主接受的第一次债务重组进程。2010年，在我自己政府的任期内，我们重启债务重组进程，并设法获得93%的债

主的批准。想想看，在拥有破产法的任何国家里，当公司破产时，法律要求至少获得66%的债主的同意，破产法官才能要求其余的债主接受其条件——至少这是阿根廷的情况。我认为，美国的数字是一样的，即66%。此外，美国这里，甚至城市都可以宣布破产，而且一名法官可以裁定，如果城市的可持续性岌岌可危，甚至更低的数字也可以接受。

事实上，阿根廷在2010年同93%的债主达成协议。2005年以来，阿根廷一贯及时交付每一笔到期债务；我们如此守时，以至于最近一次款项刚在几天前交付。那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支付的受阿根廷国内法管辖的债券。我们支付了20.7亿美元，而今天，我国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我前面提到的160%，下降到略低于45%。大多债务实际上是公共部门的债务。本国和外国两类私有债权人持有的阿根廷外币债务，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然而，我要重申，我们一直严格遵守。

2008年，在阿根廷拖欠其债务七年之后，我们所说的秃鹫基金蜂拥而入。联合国陷于债务之鹫与战争之鹰中间。这一局面比希区柯克导演的《群鸟》更为糟糕，因为希区柯克至少是一位好导演。但确定无疑的是，这些基金购买了4 000万美元的债券，它们现在想收回这笔债款，同时罔顾有关债权人同意的某些安排和延期情况。这些债权人像任何一批债权人一样，希望债务人还债，所以同意了某些安排和展期。但秃鹫基金却要收回债券的全部票面价值，而不作安排，不予展期，也不许推迟。它们将从其最初在所谓自律的市场购买的4 000万美元债券中收回17亿美元。所以，自2008年起，我们一直在谈论逾1 300%的回报。

我要问秘书长，如果在这种赌场经济中，有人能购买4 000万美元的违约债券，然后搞到一张使他们能够收取13亿或17亿美元的法院裁定书，那末，我们在哪里能找到致力于创造就业机会、进行革新和投资生产的商人？

这不只是个阿根廷的问题，及而是一个涉及整个世界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感谢法兰西共和国前往美国最高法院告状并称自己是“法院之友”。我们还感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负责人安妮·克鲁格。她现在不是，而且从来也曾不是阿根廷的一位很好的朋友，但她也这样做了。

我们还记得美国前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2001年所说的话。当时，在阿根廷的一场社会和体制危机中，有30人死于街头暴力。面对这一情况，有关方面决定由阿根廷靠自己的机制来处理问题。奥尼尔曾说，美国的管道工不应非得为阿根廷的宴会埋单。今天，我说，恢复工作的千百万阿根廷人，再次可以心怀希望和梦想的千百万阿根廷人，回国的科学家们，以及再次有机会受教育的儿童，都不必为游说者的宴会埋单。这些游说者参加这里的政治竞选活动并为政治人物的竞选活动捐款，因而拥有他们动摇国际金融体系所需的游说能力。这难道不引人注目吗？保罗·奥尼尔的断言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话相隔时间很短。

我们没有要求任何东西。我们只想让我们能还债。这一点令人瞩目。当初我们还不起债，而现在他们则不让我们还债。在一个竭力应付涉及数百万人的债务重组的世界，这似乎有些荒诞。就连美国这里也有男人妇女失业并失去住房，且不说我们在欧洲看到的毁灭性场景。

阿根廷和派代表在此出席会议的许多国家显然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成为储备货币的发行国。但我们已经表示愿意信守我们的承诺。我们认为，这一点应当加以肯定，除非有人想用一個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作为典型，因为它在并未运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强加于它的办法这样的情况下，得以爬出洞，创造就业机会和实现增长，并偿还所欠债务。

顺便指出，还有必要实行全球市场监管和市场干预。二十国集团就避税地、评级机构和资本流动等问题发表了极好的声明，但确定无疑的是，世界需要有全球法律来进行全球治理。正如我们要求遵

守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议那样，我们也要求实行法治和尊重各国主权、尤其是像我国这样愿意信守承诺的国家的主权。

最后，在这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我要向大会发言指出，今天，战争、侵犯人权行为和其他违法现象相互交织，有些也许更为微妙，例如失去工作、权利、生计或希望。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作为世界领导人，我们有责任创造真正不同的历史。

许多已经发言的人，所作发言有些自相矛盾。有些令人感到鼓舞，而有些则让人失望，因为他们未能做想做的事，几乎就好像他们想做某件事情只是一时之兴，而如果不让他们做，他们就变得沮丧起来。我认为，当我们负有治理的责任时，当我们能够利用很多权力治理一个国家时，我们不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发脾气，或者更为糟糕的是，犯错误。犯错误是我们不应当做的事情，因为为错误付出代价的不是做出决定或不完善选择的领导人。错误是用生命来偿付的，这里我们说的不仅是指战争情况下，而且也指经济事务中。就经济事务而言，为错误付出的代价是失业，以及缺乏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受教育机会、住房和安全。

我们大谈要加以打击的贩毒活动，有廉价劳动力可用。打击贩毒活动的关键之一是杜绝新兴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存在的廉价劳动力。我们还必须杜绝中心国家存在的为贩毒活动洗钱的现象，因为洗钱不是在原材料生产国进行的。洗钱发生在中心国家。这样说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听说过许多关于贩毒活动和其他事情的议论。

最后，我要援引我真喜欢的一句秘书长的话。我认为，他提出的要求是极为适当的。具体而言，他要求我们通过辛勤工作、作出承诺、体现尊严、表现正直等方式将希望转化为行动。他是“满怀热情”结束的。我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有人说，我发言有时有点太热情、太激烈。秘书长说，要“满怀热情”，但尤其要满怀同情。他说，如果

满怀热情和同情，我们就可以建设一个人民希望、世界需要的未来。

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我必须承认，我是许多年前在我自己国家听到的，而且经常听到。也许当时我并不理解它——这种激情。当时是这么用的，今天仍然由一位来自阿根廷的红衣主教这么用的，他如今已是教皇。我作为一名基督教徒，要向他致谢，感谢他在处理叙利亚问题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同情与热情——这意味着，热情接纳希望，接纳未来，接纳尚待降临的各种事物，而且同情那些弱势者，同情最脆弱的人群，同情那些正在等待着如此众多事情的人——他们什么也没做却摊上了极端贫穷和倒霉透顶，还要同情所有——战争、失业、极端贫穷和苦难——的受害者，换言之，同情我们作为世界领导人自己种种失败的受害者。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刚才的讲话。

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女士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马拉维共和国总统乔伊丝·希尔达·米蒂拉·班达夫人的讲话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马拉维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马拉维共和国总统乔伊丝·希尔达·米蒂拉·班达夫人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马拉维共和国总统乔伊丝·希尔达·米蒂拉·班达夫人来到联合国，并请她向大会讲话。

班达总统（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祝贺阿什主席当选主持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的工作。让我向他保证，在他任职期间，我会给予他全力支持与合作；我国政府也会这样做。他的学历和在联合国这里作为职业外交官的经验让我们放心，本届

会议会圆满成功。确实，我感到荣幸的是有机会再次向大会讲话。

去年我初次讲话时，我谈到了我就任马拉维共和国总统时马拉维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我概要列述了我国政府如何承诺解决我所承继的各种政治和经济治理问题。我寻求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恢复法治和尊重人权。

我国政府所实施的改革是痛苦的，但又是必需的。因此，我高兴地向大会报告，马拉维的经济正在强劲地复苏。例如，外汇和燃料有得可用，我国货币已经稳定，通货膨胀在下降，而且工业生产从2012年的30%上升至2013年的75%。

据预测，今年的经济增长可从去年的1.8%上升至5%。此外，马拉维人正在再次享有其《宪法》所载的各种自由和公民自由。

我要高兴地指出，马拉维这颗“温暖的非洲之心”再度温暖起来。我国政府致力于保持这些改革的方向不变。在向前迈进的过程中，我的议程是，在我们已经奠定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以实现包容各方的可持续增长。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反思在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已取得的进展并且探讨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在我提出我的想法之前，我要赞扬秘书长为确保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问题上开展包容各方的全球辩论所作出的努力。据我了解，有来自194个国家的75万多人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同时表明他们随时准备大胆变革。我感到高兴的是，马拉维是被选中开展全国协商的国家之一。

我相信，在马拉维及以外地区，千年发展目标在集中力量围绕消除贫穷这一共同目标开展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提高了公众对于不可接受的贫穷水平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动员人们行动起来，朝着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前进。

与此同时，千年发展目标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框架，用以监测进展情况和突出取得成绩和遇有挑战

的一些领域。确实，它们彻底改变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双方处理发展合作事宜的方式。

马拉维在实现八个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四个目标方面已走上正轨：降低儿童死亡率；防治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确保环境可持续性；和发展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然而，像其他国家一样，我们不可能实现下列目标：消除极端贫穷和饥饿；普遍享有受教育的机会；确保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以及改善产妇保健。

随着千年发展目标最后期限的临近，马拉维正在加紧努力，以加速实现这些目标。在我们的进展情况方面，我们已确定最佳做法和瓶颈问题。特别是，我们已明白，两性不平等和未给妇女赋权是限制我们向千年发展目标迈进的共同制约因素。作为应对之策，我国政府制定了一份加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新框架，其中强调要一劳永逸地消除这些障碍。

在为2015年后的结构打造基础方面，我想从马拉维的经历出发，反省一下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方面的经验教训。

第一，我认为，千年发展目标的力量在于这些目标有侧重，也有针对性。这有助于我们提高我们重点工作聚焦的清晰度，将我们的努力集中于最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与此同时，允许各地享有自主权。就马拉维而言，千年发展目标已通过《马拉维增长和发展战略》实现了本地化。

第二，过去13年教育我们认识到这些目标相互间关联的重要性。一个贫穷的家庭不只是经济上贫困。它还可能面临一系列的其他挑战，如环境的脆弱性、侵犯人权以及获取基本服务的机会缺乏或有限。因此，要让人们摆脱贫穷就必需有一个综合办法。

第三，坚定的政治意愿和伙伴关系的转变，加快了实现大部分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最后，我谨

告诫，我们必须认识到，千年发展目标建立时，各大洲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产生压力，有时带来意外后果。就马拉维和其他国家而言，在实现普及教育的过程中，我们的教育质量受到影响，而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是不应分割的。

我们都承认，就“2015年后发展议程：做好准备”的主题发展和形成共识的任务不一定是轻而易举的。然而，与13年前相比，我们现在对哪些措施行之有效、哪些措施无效，已经知之更多。我们知道，为了实现切实和持久的变化，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我们知道，为了激励和启发采取行动，我们必须胆大，建立宏伟的目标。我们知道，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的资源和人才，我们需要明智的伙伴合作关系。

2015年后发展议程高级别知名人士小组的报告为制定新的框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特别赞赏到2030年结束极端贫困的总体构想。我也赞扬除其他外，重点强调赋予女孩和妇女权能，创造就业机会和可持续生计，实现公平增长，以及确保实行善治和建立有效的机构。我了解，许多人强调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最佳策略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然而，我认为，这种想法的前提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方针。我认为，必须从提高贫困家庭收入入手。影响人口增长的问题，包括营养不良、女孩接受教育的机会和孕产妇保健，其根源都在于贫困，特别是家庭缺乏收入。若要克服这些挑战，我们需要推广能为家庭带来适当收入的政策和方案。

在这方面，我国政府一直在寻求与私营部门、地方社区和发展伙伴建立新形伙伴关系，以更具创新的方式促进发展。我国政府侧重改造农村经济，打破不发达和贫困的恶性循环。我们已经决定投资改善农村和城市地区贫困人口的生计。这项改造举措是为了在卫生、教育、供水、环卫和住房等领域实施一整套干预措施，从而实现我国农村社区现代化。

政府还推出了《马拉维农村电气化方案》，旨在通过提供电力促进工业、贸易和提高农业生产。政府还在实施社区储蓄和投资计划，以促进储蓄风气，积累资产，以增加收入和创造财富。我认为，可通过这项措施引导我国大多数穷人积极参与国家经济活动。

如果我们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不能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不能使他们能够获得体面的家庭收入，就无法打破人口增长、营养不良、产妇危险和贫困的恶性循环。2015年后发展议程若要实现其梦想，我们就必需从人民大众所在的基层做起。

因此，我欢迎这样的设想，即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下，我们应该根据所有收入水平家庭的状况衡量我们的目标进度。这将促进所有收入群体机会平等，帮助我们实现共同繁荣的梦想。这是恢复所有人尊严的关键。

最后，让我强调，必须实现全球和平与安全。我们都知道，冲突、不稳定和国内动乱破坏我们的发展努力。我们在期待2015年后议程的过程中，应该重申致力于全球和平与安全。作为一个母亲和祖母，我义不容辞，必须发出这一呼吁。

马拉维将继续全面参与制定2015年后发展议程。我满怀希望，该议程将体现穷人、妇女、残疾人和被边缘化人群的呼声。我对建成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感到乐观。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马拉维共和国总统刚才的讲话。

马拉维共和国总统乔伊丝·希尔达·米蒂拉·班达夫人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迈克尔·奇卢弗雅·萨塔先生的讲话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赞比亚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迈克尔·奇卢弗雅·萨塔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迈克尔·奇卢弗雅·萨塔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萨塔总统（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祝贺约翰·阿什先生阁下当选为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主席。我相信，他在指导大会完成今后一年的对话进程和艰巨谈判时将展现其才智。

今年会议的主题，“2015年后发展议程：做好准备”十分及时，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讨论未来全球发展的机会。为此，我谨向主席保证，在他履行本届会议主席职责时，我国代表团将予以支持。

非洲大陆今年也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5月，我们同非洲大陆其他国家一道庆祝非洲联盟的前身——非洲统一组织成立五十周年。非洲联盟象征着充满复活活力的非洲大陆的集体希望和愿望。正如人们预期的那样，五十周年庆祝成为相互反思探讨年轻多变的非洲未来方向的基础。此外，明年我国将纪念独立五十周年。我们迎接这一里程碑，对赞比亚继续享有政治稳定，并已接受民主原则，以此作为社会和经济转型基础，改善赞比亚人民的生活，感到自豪。

我国也对能够在这个次区域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建设和平倡议中发挥重大作用感到荣幸，并继续参与这些倡议。因此，赞比亚将继续致力于实现她所坚持的理想，并准备推动提升人性的全球努力。

为了满足我们各国人民的愿望，特别是最脆弱国家人民的愿望，我们国际社会在大会会议上为自己确定了千年发展目标——符合我们各国民众愿望的八项明确的具体目标。不到两年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最后期限就要来临，各国政府将有机会总结在努力实现本世纪初确定的发展目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我们都是千年发展目标的拥护者。我们进行了赛跑，我们将继续赛跑，尽管步伐不同、赛场条件不同。因此，我们从现在到最后期限这段时间里做什么，以及我们在2015年后如何行动，仍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人们焦急的期盼中，5月份发布了我国2013年的进展报告。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报告说明了赞比亚在关于到2015年使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和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四分之三的千年发展目标4和5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孕产妇死亡的根源是男女不平等，这表现为女童受教育较少、早婚、少女怀孕以及无法获得性健康和生殖保健服务。因此，这些结果告诉我们，只要付出更多努力，就可以纠正男女不平等现象。

赞比亚的千年发展目标报告进一步表明，我们在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挑战依然巨大，我们必须确保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接受最好的护理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必须尽一切努力，在迄今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实现零感染和零死亡。国际支持对于持续加强防治工作也同样关键。

赞比亚目前宏观经济稳定，经济最近显著增长。然而，我国政府仍面临确保满足赞比亚人基本需要的艰巨任务，因为贫困状况和失业仍是一项挑战。因此，不足为奇的是，我们在减少饥饿现象的发生方面取得的进展不大。为了加快赞比亚实现千年发展目标1的努力，我国政府在减少燃料和玉米补贴方面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痛苦步骤。这使我们得以释放出急需的资源，具体用于针对减贫的方案。我们也改革了社会保障服务并将之重新定位，以便最大程度地提高效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估计，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增长将高于全球平均值——2013年约为5.5%，明年为6.1%。然而，如果没有包容各方的社会发展，如果没有粮食保障，这种增长有可能因为社会排斥特别是青年遭受社会排斥而受到破坏。

譬如，我国政府虽然于2012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3%的增长，但我们认识到确保制定具体措施来促进劳动市场的平等和社会正义也同样重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正在大力提倡投资，为我国人民创造实实在在和可持续的就业前景，同时提高我国经济吸收劳动力的能力。

关于2015年后议程，我国政府认为，必须就可持续发展问题开展政府间进程，这一点至关重要，而且如何强调都不为过。我愿重申，必须制定一套可行、简明且执行起来能够符合会员国不同发展水平和经济水平的、可体现可持续发展优先目标的全球商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此外，这些目标必须保持审慎平衡，并切实整合可持续发展所涉及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问题。为此，必须建立以承诺开展区域和国际合作为依托、立足于相互问责、加强地方私营部门和公私伙伴关系的全球伙伴关系。

我国政府认为，处理贫困问题对于在我们希望赞比亚所拥有的未来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重视通过创造财富和就业、提供优质教育和优质保健以及工业化等手段，提高本国人民特别是妇女、儿童和青年的福祉。

我国政府特别希望强调，必须将儿童问题作为重要工作来处理，其中包括获得适时提供的优质教育和优质保健服务。社会保障和维护所有儿童的权益至关重要，应当是全球对于更美好未来的最大渴望。因此，2015年后议程必须考虑到在实现千年目标过程中所取得的势头，从而确保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如果不强调赞比亚的、实际上也是非洲的愿望——建成一个更加民主和更具代表性的安全理事会，我向大会的发言就不会是完整的。作为一个大陆，我们的声音再清楚不过了。我们继续呼吁在这些早就应该完成的谈判中取得更大进展。我愿重申我们在《埃祖尔韦尼共识》中确定的立场。联合国引以为荣的是，成为一个包容各方的多边进程，但

是，安全理事会却显然缺少这种包容性。应该通过使该机关适应当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球现实来提高其效力，并通过包容各方的进程获得合法性。

最后，请允许我表示，赞比亚感谢最近在主办联合国两个重要会议——即世界旅游组织大会第二十届会议和集束弹药公约缔约国第四次会议——过程中得到的支持。因此，我借此机会，代表我国政府和赞比亚人民，感谢所有参加这两个会议并为其成功做出贡献的人。我们期待有机会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主办会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刚才的讲话。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迈克尔·奇卢菲亚·萨塔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8（续）

一般性辩论

瑞典首相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先生的讲话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瑞典首相的讲话。

瑞典首相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地欢迎瑞典首相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先生阁下，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赖因费尔特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世界在不断变化，变化速度也在逐年加快。与10年前制定千年发展目标时相比，当今的世界已大不相同。但重要的是，要理解变化的性质，并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影响并塑造我们自身的未来。

我们目睹着人类历史上速度最快的减贫。儿童死亡率下降，这意味着每天死去的孩子少了1.4万。死于疟疾和结核病的人正在减少。新感染艾滋病毒

人数正在下降。人们的寿命更长。一百年前，瑞典的平均寿命还不到60岁。今天，我国出生的许多儿童将活到庆祝其百岁生日。这些确实是令人吃惊的发展。

世界经济正在增长。今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将超过发达国家的份额。10年之后，它们将主导世界经济的增长。

从全球贸易流动的扩大中，我们看到同样的格局。发展中国家出口所占的份额大幅增加，现已占到世界总出口的将近半壁江山。这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就业机会和增长，提高了全球的平等。技术变革也迅速。搜索地球另一端的信息现在并非少数享有特权者的专利，而已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举例而言，移动电话的用户人数已从不到10亿人增加到60多亿。但是，挑战依然很多，至关重要，我们要加紧努力，实现当前的千年发展目标。

瑞典继续把其国民总收入的1%捐献给官方发展援助。瑞典对多边组织、国际合作以及联合国抱有坚定的信念。联合国在协调我们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所做努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认为，我们携手努力，就能变得满怀希望而不是一筹莫展。因此，瑞典每年为联合国系统捐款约12亿美元。这使我们成为世界上向联合国捐款人均数额第二高的国家，我们为此深感自豪。

除现有的千年发展目标之外，我们还必须努力制订扎实的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其目标是消除赤贫，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准，为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在这方面，我愿提请大会注意我认为对于人类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三个领域：性别平等、民主以及自由贸易。这些领域有能力同时影响许多其它领域的发展。两年前，我在向大会讲话时（见A/66/PV.19），谈到了最重要、影响人数最多的人权失败，即，性别不平等。我想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因为现如今该挑战像以前一样依然存在，也同样紧迫。

性别平等是确保世界上半人口享有同样的人文、经济和社会权利的首要问题，这是一个应该不言自明的问题。每年，仍有10亿妇女遭受性暴力或肉体上的暴力。仍拒绝给予妇女平等机会享有保健服务，包括性健康、生殖健康以及权利。每一天仍有800名妇女死于怀孕和生育方面可预防的并发症。法律上依仍存在的限制条件，使得许多国家的妇女无法拥有、继承和获得财产。许多女孩和妇女仍被剥夺入学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对许多妇女来说，像瑞典这样女性部长多于男性部长的政府仿佛是理想的乌托邦。这些妇女中，有许多人甚至不允许投票。

在此背景下，瑞典是大力支持创建联合国妇女署这一实体的国家之一。如今我国是其最大的捐助国之一。我们坚信，通过确保性别平等还将提高一国的生产力，促进其经济并加强法治。让女孩和妇女受教育将直接导致一国经济产出的提高。受过教育的母亲更注重孩子的学业。缩小男女之间的就业率差距将大大提高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妇女在政治和商业中的参与增加，使公益服务得到显著改善，腐败减少。让妇女参与和平进程，和平就更容易实现，也更加稳固。请允许我非常清楚地指出：歧视妇女和女孩是根本不可接受的，也不是非常明智的。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一种包括所有个人的民主治理。我们需要的体制不仅应包括国家，也应涵盖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我们需要一个对其行动负责且透明的治理体制。但是，近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极权统治之下，这种现象严重阻碍了发展。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它们有机会、也有责任明智地使用这种实力，并且促进所有人的共同利益。

必须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权，无论他来自哪里、信仰何种宗教、是否有残疾、是男是女、有什么性倾向，或者是否是变性人。只有到那个时候，社会才将从所有人力资源中受益。只有当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政见，并且自由参与一个欣欣向荣的民

间社会时，他们才能真正参与其社区的生活。这也适用于互联网的自由。只有法院正常运作，人们才会感到投资和发展经营是安全的。只有尊重法治，我们才能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腐败。只有通过民主原则，我们才能确保没有冲突和暴力。

各种形式的暴力和压迫是对人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威胁之一。我们知道，打一场内战平均需要7年时间，而从战争中恢复则需要17年。正因为如此，冲突有时被称作“逆向发展”。在我们发言的此时此刻，仍有若干重大冲突在继续，导致死亡和痛苦、饥饿和疾病、强奸和性暴力。这些冲突剥夺男人、女人和儿童享有过上繁荣生活和抱有充满希望的未来的权利。仍有必要关注脆弱国家。

叙利亚已经持续两年多时间的内战必须结束。对有系统侵犯人权负有责任的人，包括对使用化学武器负有责任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但是，必须在联合国系统中处理这一冲突。迫切需要政治解决冲突，并且过渡到一个自由、民主的叙利亚。

现在应该开启一个新纪元，要让冲突中国家将能够与世界其它国家携手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为此，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和一个出色行使职能的安全理事会。

我要感谢所有联合国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人员作出的努力和牺牲。瑞典将为此提供更多捐助，并且参与这些努力。我们还大力支持民主、人权、消除暴力等领域。瑞典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最大捐助国之一。通过为叙利亚危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接收难民，我们正在努力提供帮助。仅今年，我们就接纳了16 000名叙利亚人来到瑞典。

请允许我谈谈我们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必须重视的第三个领域，即贸易和竞争。保护主义代价高昂。保护主义提高价格，降低生活水平。我要举一个令人警醒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富国的消费者和政府每年花3 500亿美元来支持农业。这笔钱足以让4 100万头奶牛乘坐头等舱环游世界了。

请允许我提及其它一些或许更实际的例子。当一些国家对移动电话公司引入竞争，通话成本降低了30%到50%。研究表明，根据《多哈发展议程》减少三分之一的服务障碍，将使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增加约600亿美元。遗憾的是，多哈发展回合进展缓慢。不过好消息是，许多国家正在尽力而为，通过区域协定来实现贸易自由化，因为它们知道，它们的经济将从中受益。

目前，美国与欧洲联盟、美国与多个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正在进行两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两项协定将涵盖三分之二的世界贸易。这将创造就业，实现增长。瑞典是欧洲联盟中作出最大努力，以便实现这项跨大西洋协定的国家之一。自由贸易和开放还意味着，新的动力和趋势会更快地影响一个国家。这给国家和公司带来改革的压力，以便应对全球竞争。瑞典就是这样的例子。

贸易使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经济产出翻了一番。我国的公司认识到，它们必须始终跟上新的潮流和技术，以便保持竞争力。不然，我们的国内总产值和生活水平就会大幅下降。我们也要记住，贸易对和平关系非常重要。简而言之，任何卖东西的人都不想对他客户所在的国家开战。打仗是糟糕的商业战略，因此，贸易促进和平。

气候变化在继续，导致世界许多地区出现极端气候条件，造成生命损失，并使社会付出高昂代价。欧洲联盟和美国的排放在减少，但全球排放总量在增加。因此，所有国家都必须为减缓气候变化的国际努力作贡献。欧洲联盟和美国无法靠自己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因为它们只占目前排放量的大约25%。

遗憾的是，我们用以处理气候变化承诺的国际架构已经过时。我们需要一项新的协定，确保所有排放大国作出充分承诺，以便我们能够实现升温低于两度的目标。

我们有责任努力建设使每个人有机会创造自己未来的社会和世界。这是每一个妇女、男子、女孩

和男孩所应得的。请允许我强调，这符合每一个国家的利益，因为人是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千年发展目标十分成功地协调了我们的努力，并把努力集中在亟需取得进展的领域。现在，我们需要为明天作好准备。在此过程中，瑞典坚信，联合国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将继续大力支持本组织。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瑞典首相刚才的讲话。

瑞典首相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本次会议一般性辩论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下午9时25分散会。